

※晚清經學研究——湖湘地區的經學※

晚清「湖湘經學研究」座談會紀錄

吳銘能*整理

整理者說明：

二〇〇三年九月七日本所暨學界友人一行由副研究員蔣秋華先生領軍訪問湖南，九月八日起，參觀了長沙馬王堆漢墓博物館、嶽麓書院，並考察了曾國藩墓、賈誼故居、瀏陽譚嗣同故居與譚烈士紀念館、瀏陽文廟、衡陽王船山湘西草堂、邵陽隆回縣魏源故居與魏光燾故居、雙峰曾國藩故居等湖湘學者的遺蹟，於九月十四日返回臺灣。旅次期間，九日假長沙嶽麓書院文廟與湖南當地學者進行交流座談，主題是集中在晚清時期的「湖湘經學研究」。大陸學者在原典文獻整理與掌握有較實際的涉入，提出了文獻資料的收藏、介紹與整理情況報告；而臺灣學者在研究方法與觀念有較新的視野，提出了研究成果簡介、研究方法的省思等。

為兼顧到研究者的需要，整理者對於講者提到某本書或某篇文章相關的出版資料，儘可能標注按語說明，留下線索以便蒐尋。初步整理的所有紀錄，都經過講者看過修正。感謝與會學者提供相關文章或專著，對此次紀錄整理帶來不少便利。湖南大學嶽麓書院文化研究所吳仰湘副教授在本所訪問研究，百忙之中，特抽晷為整理者解決部分聽不懂的湖南口音，在此亦表達誠摯謝意！

時 間：二〇〇三年九月九日上午

地 點：湖南大學嶽麓書院文廟

上半場主持人：朱漢民（湖南大學嶽麓書院文化研究所）

下半場主持人：蔣秋華（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 吳銘能，本所博士後研究。

朱漢民（湖南大學嶽麓書院文化研究所）：

我們今天要討論的人物，跟嶽麓書院很有關係，他們或者在這裏講過學，或者是這裏的學生，所以我們在這裏開這個會特別有意義。關於這個會議的緣起，我說明一下。臺灣中央研究院文哲所經學研究室做了一個非常大的計畫，做晚清經學研究，其中今年的重點是晚清湖南的經學，這個項目是由林慶彰和蔣秋華兩位教授共同主持的。他們一行人到此地，一是與湖南的學者做學術交流，另一個是到實地考察一下故居或墓地。

蔣秋華（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這次執行湖湘的經學計畫，原本應該是林慶彰教授帶團，後因臨時身體不適，改由我來帶領。我們的經學計畫有三階段，頭一階段做乾嘉的經學，現在是第二階段，範圍是晚清的經學，預計做四年，從去年做常州的經學開始，今年做湖湘地區，明年做廣東地區，然後是其他地區的經學。我們在今年八月開了第一次湖湘經學的研討會，第二次會議預定在十一月召開，邀請了朱漢民教授和陳成國教授，另外還有吳仰湘教授會到我們那兒做專題研究。

朱漢民：

今天要討論的人物是王夫之、魏源、曾國藩、王闖運、郭嵩燾、王先謙、皮錫瑞、譚嗣同、蘇輿、葉德輝，也包括清代湖南的書院。這次藉由臺灣中央研究院學者介紹臺灣地區研究晚清湖湘經學的動態，還有研究方法如何等，正好可以讓我們對臺灣研究晚清這些人物各方面都能有所了解。

我先把每位人物報告的學者做個介紹，魏源由楊晉龍、夏劍欽兩位老師講，曾國藩由賴貴三、梁紹輝、吳龍輝三位老師講，王闖運由馮曉庭老師講，郭嵩燾由車行健、王興國兩位老師講，王先謙由蔣秋華、梅季坤兩位老師講，皮錫瑞由蔡長林、吳仰湘兩位老師講，譚嗣同由程克雅、丁平一兩位老師講，蘇輿由丁亞傑老師講，葉德輝由張晶萍老師講，清代湖南書院與經學由鄧洪波老師講。時間每位有十分鐘，以不超過十五分鐘為限。我們現在從魏源開始，首先由楊晉龍教授介紹臺灣對魏源的研究概況。

楊晉龍（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實際上，魏源的研究並不是我的研究專業，我的專業是明代的經學，因為參與這個研究計畫，因此奉命要做這個題目。如果講得不夠深入，請大家多多原諒。實際上，最有資格做研究的應該是夏劍欽先生，因為他整理過《魏源全集》，我看了他的介紹；我並沒有看過魏源所有的書，我做的只是「後續研究」，所謂「後續研究」，就是對別人研究成果提出一己的看法。我是從中國文化史和後現代的角度來看這個問題，所以具有批判性的觀點，即對以前做過的研究重新評估，對別人做魏源研究提出一些個人的觀點作為參考。

我對臺灣學者的研究，提出兩個部分的內容，一是介紹比較重要的研究，另一是根據他們的研究來源，做一綜合性的分析。這是一種批判性的思考，我說的不一定對，只是提供一個角度。

過去我參加揚州學派的研究，主持《汪喜孫著作集》的點校工作，最近剛好出版^①，可以談談包括臺灣與大陸的學者都沒有注意到的部分。如汪喜孫曾經在嘉慶十九年、道光十八年與龔自珍、魏源共同討論學術；同時汪喜孫對魏源本身也有一些評價，我們必須先瞭解汪喜孫的立場，另一方面也要考慮他如何評價魏源。透過汪喜孫的關係，可以看出魏源在當時學者眼中的形象。

我的資料來源並不是我自己的發現，而是從日本的藤塚鄰得到的。日本在朝鮮和臺北都曾經建立過帝國大學，藤塚鄰在日本帝國主義時期被派到韓國（那時叫朝鮮）的帝國大學當教授，他收集了許多乾嘉學者的著作和韓國之間的學術交流資料，那種學術交流與影響力遠遠超過大家的想像，這一部分，臺灣與大陸學者，包括現代的韓國和日本學者都沒有人做，如翁方綱與金正喜的交往等，我提出做參考，還有待於我們繼續努力。

接下來介紹魏源的線索，我大部分的資料是參考夏劍欽先生的大作^②。有關魏源著作的部分，夏先生比我還清楚，我主要談臺灣學者研究的內涵包括哪些。在沒有進入主題之前，我先談談論文蒐集的情況。如果域外學者發表的文章不算在內，臺灣跟大陸大概有四百多篇，日本其實也有不少，歐洲部分我比較不熟，需要再補充，比方

^① 楊晉龍主編的《汪喜孫著作集》共分上、中、下三冊，係「清乾嘉揚州學派經學研究成果」之一，2003年6月由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出版，列為「古籍整理叢刊7」。

^② 夏劍欽：〈魏源全集各書版本概說〉，見《古籍整理出版情況簡報》，2003年第5期。

說俄羅斯、法國、德國、捷克等，他們的研究，我不太清楚。根據統計，包括臺灣、日本、美國、大陸，以及韓國一篇（韓國文字我不懂），加起來一共大概五、六百篇左右。我是站在中國文化本位立場與後現代思考角度來評價。比如魏源的《詩古微》，為什麼叫「古」？從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以復古為解放」的角度來看，魏源的思考是往後走，就是說愈古，它的價值愈高，而今天我們看魏源，卻大多是往前看，這反而脫離中國文化愈遠，卻以為愈有價值。所以，我們的思維與魏源正好是相反的。為什麼會這樣呢？如臺灣翁瑞廷就提到過，其實是因為我們現代人需要，以倒溯思想的方式，抓到而認為魏源是向西方看的，對我來說，這是有問題的。因為這種現代是單一的，以向西方看是對的、是正確的、是進步的，這是自一九〇〇年以來，西方的一種觀點，用這種角度去批評中國是保守的、頑固的、不討人喜歡的，但古人永遠是沉默的，對古人作批判是沒有意義的，他們不可能從棺材跳出來跟你辯論。在臺灣做學術研究，我們對目錄比較注意，我們通常先做文獻的探討，前人做過那些研究，當作文獻探討的一部分，必須承認，不免要受前人觀點的影響。王家儉先生當時寫的「向西方看是對的、向西方學習是正確的」，我們就往這個角度去思考問題，不斷地延伸，到最後變成「不向西方看是不正確的」，沒有其他的可能性；其實，在魏源那個時代，歷史發展有其他的可能性，只是我們後代以一固定的方式去看，而歷史發展並不是那麼地固定，如果回到那個時代看問題，就不是那麼地單一。

我們今天所做的研究，以向西方看、向西方學習的觀點是正確的，到底是歷史本來就這樣走，還是我們先有這樣的想法，然後再倒推去看呢？這是一種先見之明，還是一種誤導呢？我提出供各位做參考。

截至西元二〇〇三年六月止，臺灣學者研究魏源的專書有三部，學位論文有七部（其中兩部是博士論文），期刊論文有三十六篇。有時候是某一本書的一章提到魏源，有十四種書，會議論文有一篇，報紙文章有四篇。其中絕大部分是雜論式的，不是比較正式的學術論文，所以這部分我大概採取評論性的介紹。有關學術性論文的評論，賀廣如、方淑妃的文章都稍微提到，所以我就不再寫。

我比較重要的發現，是洪棄生(1867-1929)在一八九四年五月所寫的〈跋魏子默深書後〉^③，洪棄生就是《國語日報》創辦人洪炎秋的父亲，當時的氣氛是臺灣

^③ 洪禱：〈跋魏子默深書後〉，收入《洪棄生先生文集》（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年），第2冊，頁255-256。

割讓給日本帝國主義，這是我看到臺灣對魏源的著作做出反應的第一篇。基本上他感嘆像魏源這樣的人才為何沒有受到重用，如果他受到重用，一定可以如何如何，而這都是一種文學家的想像，用別人的誇張成就來寄託我們自己的想法。國民政府在接收臺灣後，良知在《暢流》半月刊發表了〈記魏默深先生〉的一篇雜文^④。最早以學術論文的形式是王家儉先生的文章^⑤，王先生的觀點有可能是承襲齊思和先生^⑥，我指的是主要論述的觀點，不是指內容。齊先生的看法，說得比較客氣一點，是合併王國維、梁啟超的觀點；在王國維〈沈乙庵先生七十壽序〉與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都提到清代學術有三變的問題，但最後一變，即道、咸以下代表性人物是誰，王國維沒有提到，梁啟超則提到了「龔、魏」。後來，我發現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在一九三七年出版）與〈讀古微堂集〉一文（在一九八〇年出版），對魏源的評價是不同的，可以看出錢穆早期與晚期對魏源論述的轉變過程，是對晚清學術評價極有代表性的一家。當然，我隱藏的意思是說，王家儉先生可能有承襲齊思和的觀點，但他沒有明白說出，我舉這個例子做參考，主要在說明引用二手資料的危險性，以及引用二手資料的一些可能錯誤。我能體會王家儉先生那個時代，不能明白地稱引大陸學者的文章，因為如果引用大陸學者的文章，可能就會有政治上的麻煩，所以王先生如果是在這種情況下，是可以被原諒的。

另外，提一個比較有趣的問題。一般多以為魏源後來辭官不幹，是因感慨世局之類的原因，其實魏源是因為耳聾，聽不清楚。如果對一個學者的探究，只會拿他的好朋友或兒女的評價來作為線索，那是大有問題的，我們必須參考其他的反對意見，應該是比較好的。

除了王家儉先生外，其他如黃克武、翁廷瑞、林美蘭、賀廣如、方淑妃、彭明輝、林盛裕等等的研究，是可以好好看看的。在文學藝術方面的研究，在臺灣比較沒有受到注意，所以也沒有人真正深入討論魏源文學成就的文章，只有張達人僅寫一頁的文章，不能說是學術論文。

④ 良知：〈記魏默深先生〉，《暢流》第5卷第9期（1952年6月）。

⑤ 王家儉重要的專著有《魏源對西方的認識及其海防思想》（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1964年）、《魏源年譜》（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7年）。

⑥ 齊思和：〈魏源與晚清學風〉，收入《近代中國思想人物論——晚清思想》（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事業公司，1980年）。

以下我要談談我的結論。有關魏源在經學、史學、政治思想、影響等方面的成就，一再的被渲染而接近神話化，何以在文學上的成就，完全沒有進入研究者的視野？清代不同時期和現代人「龔、魏」並稱的意涵，是否具有一致性？如果沒有，原因又何在？清代學術三變與各期代表人物，是何人先提出的？影響又是怎樣？魏源首開的「風氣」，是哪一類型的「風氣」？中國僅可以有此種類型的「研究」嗎？除了《海國圖志》之外，魏源其他學術成就是否對日本、朝鮮毫無影響？被現代人不斷「發現」的魏源「偉大超越」的思想觀點，到底是「歷史事實」，還是現代人古為今用的「歷史建構」？現代學者研究過程謾罵、指責那類反對「向西方學習」者的行徑，呈現出什麼樣的問題？我提供這些問題給大家做參考。

夏劍欽（嶽麓書社前社長）：

聽了楊教授的介紹，很受啓發，感到很高興。對於魏源的研究，臺灣的研究很突出，成果很多，而且將這些成果及海外的研究做了很好的歸納，同時也有了許多很好的新發現，譬如剛才楊教授講到了汪喜孫的資料，非常珍貴。臺、港王家儉、陳耀南等學者的專著都很有分量。我覺得對於魏源這樣的人物，臺灣學界是非常重視的。

我們湖南從一九九四年紀念魏源誕辰二〇〇週年之後，這方面的工作還沒有很好地總結，著作不少，但除了湖南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李漢武的《魏源傳》較有份量外，其他真正有新意的不多。我因為工作的需要，近幾年做了魏源研究資料的蒐集工作，以前我是關心得很少。一九九四年紀念魏源以後，一直堅持做研究，而且很有成果的，要首推李瑚先生。他去年出版了《魏源研究》，將其一生研究魏源的成績做了總結^⑦。其他有一些小書研究魏源，我看了，有一點令人感到比較擔憂的，就是沒有多少新的內容，好多說法好像不是經過自己深入研究講出來的，其中有的老是說魏源是今文經學家，強調他的今文經學思想，其實並不盡然。我反覆看了很多資料，應該說，魏源首先是對宋明理學很感興趣，然後去研究漢學，於漢、宋兩學都已步入堂奧，卻又不囿於成見，最後把今文經學當作工具來抨擊空腐舊學、抨擊社會。我覺得魏源是重視今文經學的，從他著《詩古微》可以看出：開始他對齊、魯、韓三家和《毛詩》是沒有成見的，後來發現好多東西，《毛詩》沒有解決

^⑦ 李瑚《魏源研究》係2002年由北京朝華出版社出版。

的，齊、魯、韓三家可以解釋，所以他注重恢復和闡發齊、魯、韓三家的古訓來匡正《毛詩》，盡力恢復西漢經學的微言大義。所以把他完全講成今文學家，是不太對的。

有的著作就不太負責任，我今天帶來了一本。這個人寫了《魏源傳》，但是他用的魏源像，卻並不是魏源，我打電話問出版社，到底是誰搞的？責任編輯說是作者提供的。我找作者，說是某某師範大學科研處的處長，我就很懷疑，但我還是很恭敬地寫了一封信，向他諮詢。我搞了這麼久，沒有看過這個魏源像。魏源只有兩個像，一個是學者的畫像，大家都知道；還有一個是在興化縣當縣令的畫像，那個當縣令的畫像，不能代表魏源的一生。我到隆回縣兩次，見到故居展覽只有魏源的縣官像，就講你們以為魏源做了幾年官就不得了，其實這不能代表魏源。魏源一生做官時間很短，而且官做得很艱難，那是小試牛刀，不能用以代表他的一生。魏源的一生，首先是個學者，應該用學者的畫像。但這個出版社不太懂魏源的像，我查了很久，還弄不清是誰的像，郭嵩燾也不像。

而且魏源沒有照過相，這是個照片。結果我找了作者，那個作者推得乾乾淨淨，說照片是美編加上去的，我們不知道。真是太離譜了！後來一看書更清楚了，這裏「演義」，那裏「演義」，好多都是「演義」的，那是小說的寫法。這種情況，我今天聽了楊教授的發言，感到很慚愧。這就說明作者本身有問題，當然出版社也有問題。對於這麼一個在近代開風氣之先的偉大思想家，這樣的書居然也出來了。李瑚先生對魏源的評價，一個是經學家，然後是史學家，然後是文學家，他是很了不起的詩人。我曾經在《書屋》上發表一篇文章，專門講他的憂患詩^⑧。第四呢，他是愛國主義的思想家，他的思想不斷地在昇華，不斷地與時俱進，真正地與時俱進，社會一有動盪變化，他這個積感之民馬上就做出了反應。比如看到種種內憂外患的跡象，他就編《皇朝經世文編》，改變了一代學風；等到鴉片戰爭打起來了，他希望清王朝振作起來，就寫《聖武記》；但是振作不起來，怎麼辦？他就編著了《海國圖志》，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他的思想不斷地發展，對於這麼一個思想家，學術界應該很好地研究。

聽了楊教授的報告，我覺得我們在這方面也值得做一下總結。明年是他誕辰二一〇週年，應該把大陸研究魏源的情況好好總結一下。我今天參加這個會，一個很

^⑧ 夏劍欽：〈魏源的憂患詩〉，見《書屋》，2001年第8期。

大的收穫，就是我們現在就要開始做這個工作，為以後研究的人奠定很好的基礎。我們這次對《魏源全集》的整理，是繼一九八三年五月林、楊二公的工作，當時林增平先生、楊慎之先生兩位任主編、副主編，成立了編委會，開始調查魏源的著作版本，我們是繼續他們的這一工作，又做了他們沒有做完的工作。因為那時候他們畢竟已經布置下去，在全國物色各個方面都很有研究的專家，如請暨南大學、廈門大學中外關係史的專家整理《海國圖志》，當然也有一部分作者沒有落實下來。我們從二〇〇一年開始，對原來作者的整理情況作調查了解，收集稿子。有些稿子都開始爛了，因為將近二十年了。對於那些沒有做完的，而人也不在了，我們就繼續請人做，有的就自己做；像楊慎公的《聖武記》，當年只做了一半，人就去世了，我們就接著做。這樣做下來，我們現在把魏源的著作做成二十本，每本大約五、六十萬字，總共一千一百萬字，現在全部發稿，已校對完畢的將近一半，預計到明年五、六月可以付印，下半年可以發行。我們原來想趕在魏源誕辰二一〇週年紀念日（四月二十三日）做出來，後來又想還是質量第一。我們會為《魏源全集》的第一次整理出版舉行紀念活動，希望得到各位的支持和幫助。

車行健（東華大學中文系）：

我想提幾個關於《魏源全集》的問題來向夏先生請教。一、我看嶽麓書社出的王闓運詩文集^⑨，只有詩文，並沒有經史的著作在內，我不曉得《魏源全集》是否會將魏源所有的著作都包括在內？二、在你們編全集時，是否考慮到《詩古微》與《詩比興箋》的關係，因為很多學者都認為《詩古微》與《詩比興箋》是魏源的東西，你們在編輯、整理魏源全集的時候，是否有把這部著作也考慮收進去？三、我之前曾經做過龔橙（龔自珍的兒子）論述的整理、研究^⑩，我發覺龔橙跟魏源之間的關係是非常密切的，如他的《詩本誼》與《詩古微》之間是有些承襲的，而且魏源曾請龔橙去幫他「助撰諸書」，還有魏源有《蒙雅》的著作，龔橙好像也曾經參與過。龔橙的著作很多，除了《詩本誼》之外，其他都沒有刊刻出來，他很多資料都保存在大陸的圖書館，如南京圖書館、浙江圖書館都有一些。我在猜想，龔橙

^⑨ 《湘綺樓詩文集》係由馬積高主編，長沙嶽麓書社1996年9月第1版。

^⑩ 龔橙：〈龔橙的著述與學術〉，《詩本義析論——以歐陽修與龔橙詩義論述為中心》（臺北：里仁書局，2002年），頁151-195。

的遺稿，應該會有一些魏源的東西，不知道您們在編魏源全集時曾經考慮過否？四、在編《魏源全集》時，能否將大陸、海外還有港、臺的論著，編一本魏源學術論著目錄，將其附在全集後面。像臺灣中研院文哲所的林慶彰教授就曾編過許多經學研究論著目錄^①，甚至包括個別經學家如朱熹的研究論著目錄^②，這種工作著實提供了學界極大的便利，也促進臺灣經學研究的風氣，我想這樣一來全集的使用價值會更高。這是以上四個問題，請教夏教授。

夏劍欽：

第一個問題，應該講，魏源的著作，基本上都收齊了，包括遺留的對聯，甚至在揚州、高郵、興化民間人家收藏的對聯都有。同時對於一些不是魏源的著作，我們也進行了甄別，比如《公羊春秋論》，原來中華書局把它收入《魏源集》，但是我們經過考定，還有陳祖武先生給我們提供的線索，以為應是劉逢祿的著作，這個我們就沒有收。你提到的第二個問題，魏源做了很多經書的箋注，但《詩比興箋》應算是陳沆的著作，當然魏源也做了工作，因為這是魏源在訂正《詩古微》之後，為亡友陳沆增加的一項「名山事業」。關於這個問題，李瑚先生已有專文論述，認為不僅《詩比興箋》係魏源所著，就是陳沆的《近思錄補注》也是魏源幫助完成的著作；但這是古人的贈書，是友誼的產物。所以《詩比興箋》作為一個遺留問題，我們還是考慮不宜收入《魏源全集》。第三個問題，我們也確實發現龔橙替魏源著作做了校訂，比如我們在復旦圖書館發現二十二卷本的《詩古微》就是龔橙批校的。而且我們還在上面發現魏源於咸豐五年親筆寫的一段話，這是他老年時的手跡，彌足珍貴。龔橙的批校幫了我們很大的忙，以前我們點校過《詩古微》，但有的地方沒有讀出問題，這次通過龔橙的批校，起碼查出有十幾處。

另外，關於附錄海峽兩岸、包括海外的論著目錄，這個建議很好。可是我們現在不知道到底篇幅有多大，能不能夠放在集後，比較難說。這問題我們可考慮單獨出版，或者僅收重要的文章，如十萬字左右。

① 由林慶彰主編的經學研究論著目錄，主要有《經學研究論著目錄(1912-1987)》、《經學研究論著目錄(1988-1992)》、《經學研究論著目錄(1993-1997)》、《日本研究經學論著目錄(1900-1992)》、《朱子學研究書目(1900-1991)》、《乾嘉學術研究論著目錄(1900-1993)》、《日本儒學研究書目》等。

② 林慶彰主編《朱子學研究書目(1900-1991)》係1992年由臺北文津出版社出版。

車行健：

沒有那麼多，只是條目而已。楊晉龍已經弄得差不多了，包含大陸的也有。

夏劍欽：

那太好了。這樣幾萬字以內就可以收進來了，非常感謝！

吳銘能（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賴貴三教授是我的同學，他因為有事不能來，由我來代讀他寫的論文，我就把他論文所談的問題要點做個介紹。論文題目是「臺灣公藏曾國藩古籍文獻及其專著出版研究論著目錄」。曾國藩是湖南湘鄉人，生於嘉慶十六年，卒於同治十一年，享年六十二歲。曾國藩一生最大的貢獻是協助清廷平定太平天國之亂，使他成為清代的中興名臣。曾國藩的湘軍和清廷的正規部隊有什麼不一樣呢？賴教授的文章指出，湘軍主要是由鄉勇團練所組成，其實就是把地方武力正規化，曾國藩對練兵帶兵本來是外行，是個書生，但憑著一股熱忱與決心，居然把團練辦得有聲有色、井井有條。那麼，這樣一種苦幹、堅忍不拔的精神，在我認為，就是湖南從古以來表現的一種傳統。曾國藩歷盡艱辛為清廷平定天下，被封為毅勇侯，清代以文人而封武侯的，實為少見，因此逝世後朝廷封諡號為「文正」，也肯定他在文學等方面的成就。曾國藩能夠力挽狂瀾，一度出現同治中興的局面，正好是這一過渡時期的重心人物，這不僅僅影響到當時，而且一直延續到今日，甚至於我們臺灣現在很多書局都能買到曾國藩家書、嘉言錄等等，可以顯見曾國藩的影響是非常大的。

以下介紹重要的文獻。首先是臺北故宮博物院有關曾國藩的文獻。在一九七二年二月，曾國藩的後代曾寶蓀女士與曾約農先生將曾國藩昆仲子侄的日記、家書、奏疏、札記手稿寄存於臺北故宮博物院，當時曾舉行特展；一九七八年三月改為捐贈，這批珍貴文獻得以正式入藏臺北故宮博物院，並整理編目；一九八二年出版《湘鄉曾氏文獻目錄》，作為典藏清冊以及供學界研究利用。一九九三年曾國藩逝世一百二十週年，特於十一月十九日至二十日舉辦了「紀念曾文正公百二十週年逝世紀念演講會」，邀請海內外知名學者，就曾氏的生平、事功、學問、行誼、歷史地位，做系統的研究，並出版《先正曾國藩文獻彙編》；同時配合舉辦故宮珍藏曾氏相關文獻特展，展出比較重要的，包括「清代紫光閣功臣畫像」、「平定太平天國得勝圖」、「清國史館傳包傳檔」、「軍機處奏摺」及「宮中檔曾國藩奏摺」

等，以紀念這位一代賢才。這一次會議演講的學者，第一場是唐浩明先生講「曾國藩之生平與事功」，接下來依次是中央研究院院士張玉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呂實強、中央研究院院士余英時先生分別講曾國藩的歷史地位、行誼、士大夫之學。

其次，故宮博物院圖書館藏有曾國藩的重要文獻四種，為文鈔、詩鈔、奏議、雜著，分別在清同治至光緒年間由上海醉六堂刊行，距今約有一三〇年。臺北中央圖書館藏有關曾國藩的集子六十一種，其中經過曾氏題籤的王船山、莫友芝的著作有七種。臺北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藏有關曾國藩的著作八種。臺灣大學圖書館有關曾氏詩集、手書、日記、詩鈔、家書十七種，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所有八種，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的《曾文正公文鈔》是清同治十一年張瑛校刊本，有同治十三年郭嵩燾手批。政治大學圖書館收藏有關曾國藩的著作一種。有關研究出版的狀況，臺灣地區從一九五六年至二〇〇一年為止，總共出版四十七種有關曾國藩的重要著作。從一九五〇年至二〇〇二年為止，總共出版四十一種的研究論著書目。從一九六二年至二〇〇一年有五十四篇期刊論文。從一九七一至二〇〇三年有十一篇博碩士論文。國科會計畫有兩項，一是湘軍史專題研究，二是曾國藩幕府專題研究。以上是臺灣關於曾國藩文獻與研究成果的簡單報告。

底下是我個人對曾國藩的觀感。剛才文章提到，曾國藩的影響不只是在當時，對後世也起了重大的作用。如梁啟超與康有為在流亡海外之後，基本上已經是分道揚鑣了，梁啟超在他後半生的歲月，受曾國藩的影響是非常大的，尤其他在晚年寫家書給孩子，以及在清華國學研究院對學生的談話，總是勉勵要有遠大志向，以曾國藩為效法的對象，認為曾國藩以個人的力量，將清代當時頹廢的風氣根本扭轉過來；梁啟超自己在屢次挫折，也經常以曾國藩的日記或家書中表現出來的忍耐工夫來勉勵自己，因此可以這麼說，曾國藩的影響不只是當時，也及於後代。我記得從前我在中學唸書，曾國藩的家書就被選入教科書，因此曾國藩在現代臺灣的影響力也是很大的。

吳龍輝（湖南大學嶽麓書院文化研究所）：

曾國藩是我們的前輩，我們湖南人研究他，我自己在這方面的研究並不是很多的，現在提到湖湘的研究，想到前輩的情況，還是覺得很遺憾的。

現在的湖南人對曾國藩的了解，比他們以前南嶽書院的前輩要生疏得多，學術

了解還要少，我們關注得不夠，這方面我們接觸也不夠。要感謝夏社長主持的嶽麓書社出了很多湖湘的文集，使我也有幸看到曾國藩的文集，從長輩之中也了解到一些情況。現在《曾國藩全集》又由他們送了一套，我就先拜讀了一下，但是奏稿還沒能來得及讀。讀曾國藩的集子，我有一點感想要獻給大家。

我們讀起曾國藩來是非常親切的，特別是他的日記、書信。我們看曾國藩的日記，特別是他成長的過程，讓我感覺他有很多到外地的感受，如感受到湖南有很多紅土，很堅硬的紅土地，所以湖南人的性格比較倔強。從曾國藩的書信，我看出他倔強的性格。他覺得湖南不是中國文化的中心，是中國文化的偏遠地帶，他在山區長大，個性很倔強，不斷地到更開闊的地方求學，接觸到中國文化的中心，最後是要兼善天下。無論是讀到曾國藩日記或是文章詩歌，都是以開始修身養性入手，然後是形成學問的一種擴展，都是以聖賢身教為本，我認為這是豪傑之士的見地。看曾國藩日記，覺得沒有什麼，但從身教來看，你看他這話，充滿了生機，那更有無數的心血。曾國藩當時在北京寫詩，就知道沒有人能夠與他共同鑑賞討論，所以他非常有壓力。當時有壓力，文章不能突破，但他曉得從突破桐城派的文章出發，最後寫出那麼多的文章。很簡單的東西，韓愈的文章，他就說這種文章，韓文公沒能突破，有的題目就能做，這個題目應該這麼做，那個題目應該這麼做，可以說是他每一句話都發自內心，特別每次寫文章，他就學選讀的文章，花的心血非常厲害，所以到最後都吐血了。

今天講他的經學，我覺得要談他的性格、他的毅力，他所做的努力所表現出來的特點，以及給我們的啓示。曾國藩在湖南的時候，後來在北京的日記也寫到，他在當時學校的老師比較差，他回憶他小時候在湖南，後來他到北京做翰林，他回顧人生，他說二十歲是聰明小才，三十歲是聰明大才；一個有成就的人，基本上都是到三十五、六歲就達到非常的成熟，他說王陽明到了終點，也不過三十歲左右，魏源也是講這樣的話。所以曾國藩他都是一直在進步的，從日記中我有這樣的結論。在那個時候，他生長在乾、嘉時代，他就浸潤在乾、嘉這樣的文風，所以這個學界還是比較活躍的，梁啓超當時所見到的前輩都是非常活躍的，曾國藩更加是如此。他有個夢想，當時漢、宋之爭愈演愈烈，他給劉蓉寫信，他說要「兼容漢、宋，匯為一家」，這個話還是比較有某種雄心壯志的。但是現在看來，我覺得是外行話。因為他當時對漢學的背景不太了解，就像梁啓超寫三百年學術史一樣，漢學純粹是外行，梁啓超當時雖略有所識見，但是還走不出那個藩籬，曾國藩也走不出那個藩

籬。梁啓超說漢學沒有主義，其實漢學的主義比任何主義都還要大，梁啓超沒有看到這一點，這是當時知識傳統下學問的價值評估問題，不是梁啓超所能認識的，也是當時的曾國藩不能認識的。他當時是這麼看，曾國藩也這麼看，所以才採取這樣的命題。後來他們受理學的影響，基本上就不提了。所以我覺得人很複雜，在不同背景下，有不同的提法。

當時幕府的人才非常多，各種人才都匯集到曾國藩的幕下，他的整個思想有了很大的變化，所以晚年在給俞樾寫信的時候，他就說以前不了解，現在是有變化。我看曾國藩的日記，尤其是同治年間，他在那麼忙的軍事戰爭情況下，他的日記每天說，今天看《說文解字》，今天又是讀了《戴震全集》。我覺得曾國藩最大的優點，是湖南人的倔強性格，一生體現了倔強性格的正面意義。

馮曉庭（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我今天跟大家報告臺灣研究王闈運經學的現況。事實上，臺灣針對王闈運的學術研究，特別是經學方面，是非常稀少的，就我能力所及，看到的研究成果，大概寫成專書有三部，單篇論文有十一篇，還有關於王闈運的傳記資料彙編有一部。三部專書都是學位論文，一是研究王闈運的世變觀，另一是研究其詩學，再來是研究其春秋學。單篇論文，早期大多是研究王闈運的生平以及生活上的一些軼事趣聞，晚近，有人研究他的政治思想、文學創作。最重要的一部經學研究著作，是魏怡昱小姐在今年六月完成的《王闈運春秋學思想研究》，這部書的特色，是關注王闈運的《春秋》學與當時的政治與社會秩序之關係，而對《春秋公羊傳經》、《春秋例表》、《穀梁申義》等作品，並沒有深入探討，也就是說她沒有辦法有條理地探討王闈運在《春秋》經典詮釋的特色；第二點，她提出了王闈運《春秋》學的特色，由宗傳到宗經，也就是王闈運治《春秋經》的歷程，另外由《公羊》三世說演變為政以兼的觀點，還有《公羊傳》講的撥亂反正之道，其基本立足點應是自治與禮。還有一點，是所謂的「華夷之道」，其最終的理想是自正，也就是自己端正自己的行為跟思想，然後去感化夷狄，以進到大同。她的論文比較有特色的，是把《春秋例表》的二個版本，一是光緒七年長沙刊本，一是光緒三十四年東州刊本，兩者做了比較，發現長沙本是以《公羊傳》和何休的觀點作為立場，東州本完全以《春秋經》的書例作為立場，所以她認為王闈運治《春秋》學，有慢慢脫離《公羊傳》到真正詮釋《春秋》的思想，這是很清楚的。魏小姐大概受錢基博「王闈運是疑古學

派先驅者」說法的影響，所以有如此的論點。我的觀察，王闕運的確有慢慢脫離《公羊傳》去詮釋《春秋》的思想，可是他本身並沒有很完整的體系。王闕運在經學上的成就可能不是很高，所以相對於魏源等學者，臺灣學界的關注算是非常少的。

另一位比較具體研究王闕運經學的，是臺中逢甲大學碩士張清泉先生《清代論語學》，把王闕運的《論語訓》放在「傳注類」，只是簡略的介紹而已，並沒有講到內容思想的重心。事實上，王闕運解釋《論語》的立場，與《春秋經》的立場是非常接近的，常在《論語》發揮《春秋經》的觀念。我們在座的吳銘能先生，他是專門研究王闕運的學術，我相信等一下他應該會有非常詳細的補充。我個人以為，臺灣研究王闕運經學的成果，事實上還不能說有什麼成就，只是一個初步的階段。也許在與各位交流以後，大家共同努力，或許王闕運的經學會有更多人的關注，也可以真正呈現最確實的面貌。

吳銘能：

我剛才被點名做王闕運的補充，我在此大略講一下。根據我初步對王闕運的研究，覺得他是一個非常特殊的人物。近代我們都認為他觀念非常守舊，但好像也不是這麼一回事，一個很奇特的現象，他在當時很得人望，是個名士，那時在思想上比較先進的人物如陳獨秀、梁啟超、蔡鐸、黃興等，經過湖南王闕運居住的地方，都要去拜訪他，所以我們把王闕運擺在守舊派的人物之中，恐怕要再重新檢討。應該說，王闕運對中國文化有絕大的信心，他認為西方的船堅砲利及打仗用的兵學，中國拼命去學這些是沒有用的，當時他有個觀點，認為西洋人不過要跟中國通商，只要中國開放幾個港口滿足他們通商的欲望，西洋人就不會出兵打中國。我認為他這個想法，並不是毫無道理的。因為他對中國文化具有絕大的信心，所以他認為「只能以夏變夷，不能以夷變夏」，當他的好朋友郭嵩燾出使英國返來，發表了《西游日記》¹³，他看了之後，大罵郭「中毒深矣」，這可以看出他對中學、西學的態度。

除此之外，王闕運在史學方面也有相當的建樹。他對章學誠批評得非常厲害，

¹³ 正確名稱應該是《使西紀程》。

以為只是個「秋風客」。不過，我個人認為王的批評不一定對，章學誠在方志學的成就，不但有理論，也有實踐，王倒是沒有什麼理論，他把所有正史著作通通看完，而且詳細點讀，還寫了評傳，這是花了幾十年的功夫，他自己也修了四部方志。當然，他寫《湘軍志》非常有名，《湘軍志》在當時也受到很多的爭論，但因王闈運本身的文筆非常好，所以現在談湘軍，大家還是要看王闈運的東西。另外，他在詩文的造詣也不錯，尤其是〈哀江南賦〉和〈圓明園詞〉。他所寫的〈圓明園詞〉，在北京傳誦一時，張之洞看了之後，非常佩服，還向他索取早年寫的〈哀江南賦〉，可以想見王闈運在史學、文學的成就很高。在經學方面，剛才馮曉庭先生提到一點，他不大遵循傳統的傳注，這是一個很大膽的突破，因為過去談到經學的傳注，不管是今文經學或是古文經學，都要遵守家法來談，但王闈運認為經學的家法傳統在當時已經斷了，所以他要反其道而行，把前人的注釋一腳踢開，要以自己的想法來談，他要談出他理想中國的世界。因時間關係，還有很多學者要報告，我就補充到這裏。

吳龍輝：

湘潭大學有位蕭艾先生寫了一本《王闈運評傳》，在九四年出版。

夏劍欽：

我提供一個訊息。馬積高先生在世的時候，曾經幫忙箋校《王闈運丁未後未刊詩冊》。這本是陳雲章先生珍藏的王湘綺詩作手稿，請馬老對手稿做的箋注。後來馬積高先生去世了，這個本子沒有人整理，因為馬先生箋注手稿行草書的字很多，我就幫他做這個工作。後來我退下來了，報過國家的出版補貼，沒有補貼，書也沒有出。後來被譚恒岳先生拿去，譚恒岳是譚嗣同的後裔，現在臺灣，他沒把書印好，還把書名搞錯了，搞成王闈運詩集。其實，王闈運詩集已刊，只是還有一部分未刊行。後來這個稿子又退回來，這稿子還沒有出。我們正在想辦法，看能不能在美術出版社出版，因為這是很好的美術作品，有王闈運的手跡。從這些丁未後的詩可以看出王闈運的思想，並不是那麼固執、守舊，他的思想是很複雜的。馬積高先生曾經分析到這一點。（案：此書現已決定在嶽麓書社出版。）

龔鵬程：

我有個體例上的問題想請教。你那個〈王闕運經學研究現況〉裏面談的都是王闕運的經學，後面那些論文有談文學的，應該把它擴大來寫。還有我們做論著目錄從名稱上判斷，有很多書不是從名稱可以判斷，它是分散在其中的章節。

馮曉庭：

謝謝老師。

龔鵬程：

還有湘軍部分，事實上，像前面談曾國藩，湘軍部分都沒有，只有在後面國科會專題報告裏面提了一下。可是如果要把《湘軍志》列進去寫，就要通通列出來。要不，把《湘軍志》全部拿起來，不然的話，太多了。體例上不應該這樣子。

吳銘能：

因為這是賴教授的論文，我再轉達他。基本上，我同意您的意見。

卓行健：

我報告的題目是「臺灣學界對郭嵩燾研究之重要成果簡述」。平心而論，臺灣研究郭嵩燾的成果並不是很多，整體來講，數量沒有像魏源那麼多，而且有些是沒有學術性的文章，這裏收進來的只有五種。第一個我介紹的是《郭嵩燾先生年譜》，由中央研究院近史所出版，這本年譜創稿於尹仲容，但由郭廷以先生重新改寫，所以這本書的著作權還是要歸於郭廷以先生。楊聯陞教授曾經在《清華學報》對這本書做了簡要的書評，對它的體例、價值有了非常簡明扼要的介紹，請各位看資料，不再重述。這本年譜除了客觀呈現郭嵩燾生平經歷及學術思想之發展歷程之外，郭廷以在自序中概括他對郭嵩燾一生事業及核心思想，認為郭嵩燾一生大都在「平亂」（平定太平天國之亂）及「禦侮」（以英國為首的外患）這兩件事上有關係的。郭廷以先生也對郭嵩燾的性格做了客觀的評判，認為他性情褊急、自視太高、自信過強、孤持己志，動輒與人為忤等，這些性格的特點也導致他在官場上的挫折與不如意，與僧格林沁、毛鴻賓或者是他的助手等，都沒有辦法相處得很好，所以這是他性格上很大的缺憾。這本年譜，我個人的評價還算是相當高的，雖然出版已

三十多年，在體例及資料上都是非常完整充實。唯一比較可惜是沒有辦法利用到郭嵩燾的日記，當然這無法責怪作者，因為這本日記出版是蠻後面的事情，今天如果有人願意根據《郭嵩燾日記》豐富的材料去補充，甚至重新改寫年譜，我想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第二本是汪榮祖先生的《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燾與道咸同光時代》。汪榮祖先生嚴格說來，並不是臺灣學者，他現在旅居美國，常常往來兩岸之間，但是他主要成學是在臺大歷史系，跟臺灣學界往來互動密切，而且這本書是由臺灣東大圖書公司出版，所以我把他列入臺灣學界的研究成果。這本書可以說是關於郭嵩燾的綜合性傳記，也可以說是臺灣學界繼《郭嵩燾先生年譜》之後比較重要的專著。此書，汪榮祖先生在序中就說「這本書寫一個人，以及這個人生長的時代」，把視野放在郭嵩燾所生存的那個時代，西學東漸，面臨西方的挑戰，郭嵩燾所做出的回應，但這個回應本身是失敗的，所以書名叫《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燾固然面對西方世界的挑戰的回應是失敗的，可是放在後面來看，愈發顯示郭嵩燾無論是識見，或者是主張，愈來愈顯示他走向世界、向世界開放的見解，與後來歷史的發展是吻合的；所以他是一個比較有遠見的人物，他的思想在當時沒有辦法受到時人的重視，後來的歷史證明他的看法是正確的。今天中國大陸自一九七九年「改革開放」以來，已是第二波的走向世界，我想學界對郭嵩燾的研究興趣，肯定會愈來愈濃厚的。這本書還有一項特點，那就是對他的「感情世界」多所著墨，利用了《郭嵩燾日記》記載的許多私人的情感、想法，去還原他本人的「感情世界」，形成本書的特色。我舉一個例子，《郭嵩燾日記》記載他夢見了康熙皇帝兩次，反映他救世用世的企圖是很盛的，他很多次都表現要退隱，不願意再做官，實際上，從他不只一次夢見康熙皇帝看來，蒙康熙召見，郭嵩燾用世的企圖是非常旺盛的。整體來講，這本書也是相當成功的郭嵩燾傳記，但是，汪先生對於郭嵩燾學術思想的處理，是略顯不足的。

第三是陸寶千先生幾篇關於郭嵩燾研究的文章，如〈郭嵩燾〉（收入《中國歷代思想家》第四十四冊）、〈郭嵩燾〉（收在《清代思想史》第八章）、〈郭嵩燾養知易傳輯〉（發表在《漢學研究》十一卷二期），我對陸寶千先生是很肯定的，他可以說是臺灣學界對郭嵩燾學術思想做比較全面深入研究的學者。他早年曾協助郭廷以教授補輯《郭嵩燾先生年譜》，他的〈郭嵩燾養知易傳輯〉是根據《郭嵩燾日記》中論《易》的材料，依〈序卦傳〉而次第整理輯成的一部著作。另外，〈郭

嵩燾〉一文全面去看郭嵩燾的理學、禮學、史學以及洋務思想，也提到「循理」這個觀念，其實是來自宋明理學，所以郭嵩燾對傳統學術的根基還是很深厚的，除了理學之外，史學還有經學造詣都是有目共睹的。

第四是黎志剛的〈郭嵩燾的經世思想〉（收入近史所舉辦《近世中國經世思想研討會論文集》），這篇文章重點雖是論述郭氏的經世思想，也包含發展理論、政治教育及社會思想與外交思想等，從《郭嵩燾日記》看到郭嵩燾對西方學術的學習，這是引起我相當興趣的地方。最後一篇是孫致文的〈郭嵩燾禮記質疑解經方法及態度初探〉，專門提出郭嵩燾對《禮記》這本書的解經方法。

最後我提出三點結論：一、臺灣學界對郭嵩燾的研究雖然取得一定的成果，但整體看來，在數量上仍不夠多，有待學界持續投入研究。二、研究領域較偏重在史學研究，諸如傳記及洋務活動等，對其學術思想的研究稍嫌不足，我判斷可能是中文學門的學者對郭嵩燾學術的研究投入較少，所以才會造成這種現象。三、郭嵩燾學術思想中的傳統成分與現代（以西洋為主）成分之關係、交涉與相互影響的課題，是可以做進一步深入探討。

王興國（湖南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

剛才我聽到車教授講臺灣研究郭嵩燾的情況，有些著作我也看了，很多沒有用到《郭嵩燾日記》，因為郭嵩燾的日記一直放在湖南圖書館裏，是稿本，到了「文化大革命」以後才開始整理。我參與了整理，在那裏一次又一次地抄，搞了很久，才找到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大陸目前研究郭嵩燾的情況，我大略講一下。在八十年代以前，有關郭嵩燾的研究是放在《中國近代人物研究信息》裏面，由天津教育出版社出版，情況有所介紹。八十年代以後，據我所掌握，有三本郭嵩燾的傳記，最早的一本是曾永玲寫的《郭嵩燾大傳》，由遼寧人民出版社出的，她也是湖南人，在東北教書，她的書最大特色是把郭嵩燾的生平、政治思想、洋務思想和時代背景介紹得比較詳細。最近又有另一本是文學方面，叫《郭嵩燾別傳》，我買到一本，但還沒有仔細看。我的《郭嵩燾評傳》是一九九六年由南京大學出版社出的。過去幾本書，包括剛才介紹的汪先生的書，基本上是從政治方面研究郭嵩燾，因為他是著名的洋務派，所以偏重在政治思想及洋務思想，學術思想講得少。我那本書不知道臺灣學者看過沒有？

我那本書寫了四十多萬字，學術思想比較全面，包括生平、政治思想、經濟思

想、哲學思想、經學思想、教育思想、倫理思想，還有文學思想，一共十四章，關於經學方面，我專門寫了一章，到目前為止，我的研究還是比較全面的^⑭。關於郭嵩燾本人的著作，我在書中作了介紹，大概我所掌握的，不下於五十種，但現在保存下來的只有二十多種^⑮，經學方面的著作，還有一部分手稿；陳戍國先生整理的《禮記質疑》在九十年代出版，另外有《大學章句質疑》、《中庸章句質疑》，就這兩本書一直沒有出。還有《毛詩質疑》，沒有單行本，放在《日記》裏面，是他在廣東巡撫下臺、罷官回來，在船上寫成的，也有好幾萬字，還有《尚書質疑》、《朱子家禮》、《詩疑義》、《鄉黨議》，這些著作都是手稿，我沒看到，還在湖南師大圖書館裏，所以郭嵩燾的著作很不少，但整理出版的不多。我們夏社長原來有個打算，要我整理一下，我編了一個目錄，估計有好幾百萬字，應該不會少於五百萬字，因為《日記》就有二百萬字。真正講洋務思想，郭嵩燾是個從古代到近代橋樑性的人物，講老實話，中國洋務思想最先進的人物是他，而且當時他在經學方面、考據學方面都很專精，有很多交流的學者。

關於他的經學思想，這裏不可能詳細講，我只簡單講一點。我覺得他最重要的特點是調和漢學與宋學之間的矛盾。他治經不主一家，他的《禮記質疑》主要是質疑鄭玄，《大學章句質疑》和《中庸章句質疑》主要是質疑朱子，他對朱子有些注解很不滿意，他在進行調和的時候，就是「實事求是」。原來漢學家打的旗號是「實事求是」，宋學家打的旗號是「窮物求理」，後來曾國藩出來說，漢學家講的

^⑭ 關於經學方面，參見原書第十一章〈調和漢宋、堅持致用的經學考據思想〉。

^⑮ 郭嵩燾編寫或編輯的已刊著作有《會合聯吟集》、《湘陰郭氏家譜》、《羅忠節公年譜》、《湖南褒忠錄初稿》、《使西紀程》、《罪言存略》、《祭煙公社條規》、《湘陰縣圖志》、《湖南通志》、《禮記鄭注質疑》、《大學章句質疑》、《中庸章句質疑》、《校訂朱子家禮》、《郭侍郎奏稿》、《養知書屋文集》、《玉池老人自敘》、《史記札記》、《郭嵩燾日記》等十九種。未刊著作有：《山東稅務奏議章程》、《毛詩餘義》、《綏邊徵實》、《周易釋例》、《思舊錄》，以上五種稿本，目前下落不明；郭嵩燾箋王船山《周易內傳》、《尚書疑義》、《詩疑義》、《鄉黨義》，以上四種稿本，現存湖南師範大學圖書館；《慎終錄》、《官書》、《尺牘》、《讀書錄》、《思舊錄》、《莊子評注》、《養知書屋制藝》、《四書義前編》、《石筍山房題詠集》、《老要娥眉》、《金縷酬春詞》、《劍閑齋石門問答》，以上十二種已佚；《韓文札記》、《性理精義札記》、《正學編札記》，以上三種不詳所在。湖南省圖書館和湖南省博物館還收藏有郭嵩燾未刊手札若干種。以上情況詳見王興國：《郭嵩燾評傳》，頁187-200。

「事」，不就是宋學家講的「物」嗎？漢學家講的「是」，不就是宋學家講的「理」嗎？漢學家的「實事求是」不就是宋學家的「窮物理」嗎？他一下把二者統一起來了。「實事求是」原是考據學家的命題，曾國藩把它變成了哲學命題，而郭嵩燾最大的貢獻是把「實事求是」這樣의思想和西洋的「科學」精神結合起來，他說「實事求是」是西洋之本，把「實事求是」與西方的科學哲學統一起來，他這方面的論述很多。這樣的思想，一直影響到近代，後來章太炎、曾紀澤、譚嗣同講「實事求是」，都是把西方哲學拉進來，所以我覺得郭嵩燾對西方近代的溝通，貢獻也是很巨大的。一九九八年我們還在湖南岳陽開了一個郭嵩燾的研討會，會後出了一本《郭嵩燾與近代中國對外開放》¹⁶。

吳銘能：

我想提一個問題。郭嵩燾和王闈運兩人其實是好朋友，但經常吵架，我不管從《郭嵩燾日記》或者是從《王湘綺日記》看來，都可以發現兩人對經學有很多的討論，剛才講到郭嵩燾的經學與西學連在一起，那麼王闈運對西學卻反其道而行，所以非常有意思，他們兩人要怎麼討論問題？另外，我提供一項資料。王闈運寫完《湘軍志》後，刻本出來，送一部給郭嵩燾看，想聽聽郭的意見，結果郭嵩燾在上面批著密密麻麻很多的反駁意見。這個批注稿本目前收藏在臺灣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

王興國：

後來郭嵩燾批本出版了，叫《湘軍志平議》。與那稿本有沒有一樣？

吳銘能：

我曾經核對過。大致上是一樣的。

蔣秋華：

我今天要跟大家報告有關臺灣研究王先謙的概況。晚清學者王先謙從中進士到

¹⁶ 王曉天、胥亞主編《郭嵩燾與近代中國對外開放》係2000年6月由嶽麓書社出版。

做官，以及他做官後的生活與重要工作，多半與學術、教育、出版，有密切的關係。他的治學重考據，有很多的著作，在湖南是學界的泰斗，但因他反對改革，激烈抨擊維新人物梁啟超等，以致受世人非議，學界對他學術成就的探求並不熱絡，甚至給予不公允的評價。

整個來看，臺灣發表有關王先謙的研究文章，大部分是傳記生平方面，就學術上而言，並不是很重要，因為大多是參考王先謙的自訂年譜，然後再寫一些簡單的人物回憶、趣聞逸事，屬於淺顯介紹性質的文字，我就不多說了。

有關學術方面，我想就經學、文獻學、史學研究等方面來看。

經學上，有許維萍〈王先謙對經學研究的貢獻〉一文，指出王先謙從文獻的角度來從事經學資料的蒐集與整理，並介紹他在《詩經》與《尚書》研究的經過及特色，還有輯刻《皇清經解續編》的介紹。曾在臺大博士班研究的美籍人士麥哲維，撰有〈考證學的新面貌：從《皇清經解續編》看道光以下的學術史〉，以阮元編的《皇清經解》與王先謙編的《皇清經解續編》來探討道光以下考據學的發展。另外，大陸學者虞萬里也在臺灣發表〈正續皇清經解述略〉，對王先謙編《續經解》有概略的介紹。尚書學方面，研究論文不多，許燦輝教授的〈王先謙伏生尚書二十九篇無太誓說衍義〉，是僅見的一篇。

文獻學方面，大陸學者劉旭青在臺灣發表〈略論王先謙文獻整理的成就〉，談的是王氏整理文獻的貢獻。臺灣學者研究王先謙的學術，最可觀的部分，是在子學方面，不僅有多篇考證文章，更有兩本專論的碩士論文。荀學方面，臺灣學者的研究成果最豐盛。有潘重規〈王先謙荀子集解訂補〉、龍宇純〈荀子集解補正〉、李滌生〈荀子集解校補〉、趙海金〈荀子集解補正〉。臺灣學者研究王先謙的著作，整體而言，數量並不豐碩。

至於王氏其他部分的研究，如政治、史學、文學等，似乎沒有引起臺灣學者的注意，反而不如大陸學者重視。

朱漢民：

謝謝蔣秋華教授的發言。下面請嶽麓書社的梅季坤老師，他研究王先謙，寫過一系列的文章，又編了《葵園四種》。

梅季坤（嶽麓書社）：

我叫梅季坤，筆名梅季。

王先謙是一個集官、紳、商、學於一身的複雜奇人。他集官僚、紳士、商人、學者於一身，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奇人。他的官不大，做國子監祭酒，又當江蘇學政。當國子監祭酒的時候，他上奏折直接批評慈禧太后，說湖南鬧水災，山東鬧旱災，你還搞三海工程，搞得民不聊生。慈禧太后大怒，第二年就下放到江蘇做學政。光緒十四年，他又上折參奏李蓮英，結果只好回家。他當官很耿直，但是不成功。再看做紳士，他回到湖南以後，在城南書院、嶽麓書院做山長，有一段時間與梁啟超他們作對，遭到非議，挨了很多罵，所以他這個教育家也是不成功的。大約是光緒二十年到光緒三十幾年，他在湖南辦了很多實業，我估計他基本上也是虧本的，所以他做商人也是失敗的。但是，他在一生中，編纂、著輯、刊刻經史子集四千多卷，這在中國歷史上是罕見的，他的學問是成功的。所以說他是個複雜的奇人。

我說他在學問上成功，有三個根據。儘管慈禧太后不喜歡他，但是因為他的著作很了不起，光緒三十年不得不賞他一個內閣學士的銜，這是一個證據。其二，一九四三年，蔣中正給他的後人題了一個辭「碩學懿文」。第三，一九四九年湖南解放，他還有一個夫人和一個兒子沒有飯吃，因為他的藏書全部捐贈出去了。後來王季范、楊樹達見了毛主席，說王先謙的後人沒有飯吃，怎麼辦？毛主席就給長沙市政府來一個公函，說王先謙政治上不可取，學術上還是很有成就的，他的後人應給予照顧。這個公函原來放在長沙市軍管會，王先謙的一個女婿看見過。可見，從清朝的慈禧太后，到中華民國的總統，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席，都對王先謙的學術作了肯定。但是，從民國初期直到現在，大陸的著作中涉及到他，主要不是因為他經學上的成就，而主要著眼於政治，多是罵他，各種工具書都說他是保守人物，尤其是胡繩的《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罵他是世道人心不恥的土豪劣紳。

我對王先謙感興趣，是因為我八十年代在湖南省古漢語學會和中國訓詁學會擔任了一些職務，結果就很注意王先謙，因為他有《詩三家義集疏》、《尚書孔傳參正》，這是經學上的，又有《漢書補注》、《後漢書集解》，屬於史學，還有《荀子集解》，但講起來他最大的成就是訓詁，他是晚清最有成就的訓詁大師。我在八十年代就寫了〈王先謙的哲學思想及其成就〉，在《船山學報》發表，有一萬多字，全面地論述他的學術思想與成就。然後在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紀念嶽麓書

院成立一〇一〇周年論文集》中，我寫一篇〈光輝與陰影〉，主要講他的教育思想，因為他在城南書院和嶽麓書院擔任那麼久的山長，他的教育思想實際上還是很先進，但是罵他的人都沒有注意到這一點。因為罵他的人太多了，哪怕是作為長沙市人，現在長沙市出版的著作，包括《長沙市志》，還在說王先謙是土豪劣紳，說他如何保守，我感到很惱火，所以花了兩年時間，只考證他四件事情，一是戊戌變法時期，他在長沙的整個表現，一是自立軍告密的問題，還有一個是華興會告密的問題，再就是長沙搶米風潮，涉及到王先謙，加給他不少不實之詞，對這四件事，我進行了考證，寫了一篇〈葵園四事辨〉，可以說全面推翻原來的結論，這篇文章發表在中華書局的《文史》^{①⑦}。張舜徽先生當時是我們歷史文獻研究會的會長，他對這篇文章評價很高。他說這篇文章一出，關於王先謙的一切不實之詞可以一概推倒。

我再補充一句，嶽麓書社一九八二年成立後，規劃了六大古籍整理，老社長今天也在這裏^{①⑧}，當時規劃了王夫之、魏源、曾國藩、左宗棠、王闈運、王先謙六大全集，到八四年以後，老社長調往省社科院，新社長上任，王先謙就不做了，王闈運不搞了，魏源暫停，王夫之也暫停，就搞了曾國藩和左宗棠，後來做了王夫之、魏源，至於王闈運，就只出了詩文集和《湘綺樓日記》，王先謙只出了《葵園四種》。

下 半 場

龔鵬程（佛光大學榮譽校長）：

在談船山之前，有兩點我必須要先說明的。第一點，這次談的大部分是晚清的湖湘學者，船山的著作雖多，但早期並沒有刊布，他的《船山全書》實際的出版應該刊布很晚，在光緒年間才慢慢流行，產生具體影響，所以就思想史的發展來看，他算是比較晚出的，應該是晚清的。第二點，因為我離開臺灣已經很久了，他們整個安排我不太清楚，我來了之後才發現臺灣部分，王船山正好沒人報告，所以就派我來報告。我手上沒有具體的資料，只簡單說船山學在臺灣的流傳情況。

^{①⑦} 見《文史》，第33輯，頁299-308。

^{①⑧} 指梁紹輝先生。

船山的著作在臺灣流傳比較早，早期的革命者，無論是國民黨或共產黨都非常推崇船山的種族主義或民權主義等，如他的《黃書》、《噩夢》。因此在國民黨內部有許多人是非常推崇船山的，再加上曾國藩也非常推崇湘學，在臺灣有具體的影響，《船山全書》早就流行，另外還有船山學社就把他的著作刊印出來。另外有其他出版社陸續刊印了船山著作的不同版本，譬如說船山的《薑齋詩話》收在《清詩話》裏，或者是廣文書局印過他的《楚辭通釋》等。臺灣出版古籍有一段時間是非常多的，有一家出版社叫河洛，河洛喜歡刊行大陸點校的古籍，船山有關《莊子》、《老子》的著作就曾經翻印過，還有《宋論》、《讀通鑑論》在臺灣也流行非常廣，有很多書局不斷地刊行，像剛才講的《薑齋詩話》，《薑齋詩話》原來收在《清詩話》裏，後來大陸做了《薑齋詩話》的校釋以後，才有單行本另外重刊，在《宋論》、《讀通鑑論》的另外刊本，也非常多。所以船山可能是清朝幾大家（如顧炎武、黃宗羲）來比較的話，其著作在臺灣流傳較廣，而且傳述也比較多。

在臺灣對船山學的傳述和討論雖然非常的廣泛，但專門的著作，或者是專門的名家，並不是很多。早期的商務印書館曾經翻印過《船山學譜》，後來大家在著作都會提到船山，特別是熊十力跟船山學的關係。在臺灣講新儒家，大概每個人都讀過船山的集子，不過近幾年來專門研究船山並不太多。船山研究大概集中在三大塊，一塊是有關《易經》學部分，通過船山的《易》學，去掌握船山的思想；第二塊是有關他史學的部分，如有關《宋論》、《讀通鑑論》史學的部分；第三大塊是以船山的《薑齋詩話》為主，還有文學理論的部分為主。至於他的佛學思想、《讀四書大全集》等等的專門研究，是比較少的。目前學術界比較有影響力的幾家，一個是曾昭旭先生的《王船山的哲學研究》（他本來的碩士論文做的是「兪曲園學記」），他等於做了一個新的船山學案，後來把船山學案改名做「王船山的哲學」，前面是根據王船山的生平、著述狀況做一些說明，後面比較集中的討論船山的哲學。因為他比較集中討論船山的哲學，所以前面討論船山的著作就比較簡略，後面心性論和儒家傳統比較有關。他那部分哲學的討論，還是以船山的《易經》為主，曾昭旭先生對船山的《易經》如「乾坤並見」等有非常多的體會，從《易經》衍生出來的船山哲學為主，其他船山的史學或者船山的文學，基本上都討論得不多。第二位名家林安梧先生，他的指導教授是牟宗三先生。林安梧先生的研究，是兩個部分，比較主要自成一派的講法，一部分是船山的史學論述，他有比曾先生更多的關注，他認為《讀通鑑論》、《宋論》顯然是一種人性史哲學。人性史的哲學分兩部

分講，一是講明心見性，講人性在歷史中呈現的各種變化；第二種要談的是歷史中的人性，在歷史的發展中，我們可以看出人性的偏曲。這樣講歷史從兩端扣，這樣講船山，可以發現人性的價值，這一點在說明船山的人性哲學，這是比較重要的。後來，他在博士論文及以後，說要突破當代新儒家由唐君毅、牟宗三以下這個傳統。他發現這個傳統到了牟先生以後，生命力慢慢開始萎縮了，創造性的想法，已經形成一個局限，那該怎麼辦呢？由牟先生回溯到熊先生，也就是突破牟先生對熊先生的解釋，重新打開一個新的陣營，然後由熊先生的講法再往上走，走到船山，這叫做「後牟宗三時代」的儒學發展，他覺得這樣才可以替當代新儒學展開一個新的局面。他這兩個講法都是頗有爭論的，如新儒家是不是該有這種走法？又從牟先生到熊先生、熊先生到船山，這路是該怎麼樣的走法？或者是他所謂的「人性史的哲學」，這種「人性史的哲學」講法，對船山哲學是美化式的講法，還是恰如其分的？這當然是有爭論的。船山論人性，我感覺好像不是論歷史中的人性。人都是人，都有人性，這點沒有錯，但船山認為君子與小人就有不一樣的性，夷狄與華夏就有不一樣的性，人類與禽獸也不一樣，但船山所重視的不是那個「性相近」，而更強調「習相遠」，因為「習相遠」所處時不同、所處位不同，所以那個「性」就會改變，這是船山人性論比較特別的講法。要從這個地方來看，才能知道船山為什麼反對商人，反對婚姻，反對女人（不喜歡女人），結合這些理論，才能了解船山為什麼這樣看。

另外以文學為主的方面，相關研究很多，大概集中在船山詩論的討論，一個是船山的情景理論，另外一個是船山對詩概念的界定。在明末清初，錢牧齋注杜詩的時代，船山對杜甫評價不高，船山不喜歡杜詩，船山對六朝的詩較喜歡，不喜歡唐、宋的，更不喜歡杜甫。船山的《詩廣傳》有一部分是擴充《詩經》，討論詩的寓意與做法，是屬於箋注的部分；另外，有把船山的《詩廣傳》擴大到與詩選詩話的結合一起看，這是有關他詩學重要的一部分。

其他有關船山作品談得比較少的，如「船山的莊子學」、「船山的老子學」，這些論文實際上沒有得到了重視。船山的著作，在晚明是非常重要的學術著作，在晚明的佛學，只有零星的討論，很少專門來討論。另外，他的楚辭學、四書研究的人不是很多，這當然是比較遺憾的地方。

另外要做一點補充，從剛才的介紹和討論中，可以發現湖湘的學者很少專門名家之學，多半是博通的。像戴震的詩不好，章學誠的詩也不好也很少作，或者是王

念孫父子，都是很集中在專門的經學家，但是湖湘學者是博通的比較多。過去論浙東、浙西，一個貴專門、一個貴博雅，湖湘學者是博雅的情況最明顯，在詩文、在哲學、在經學、在實務上都是會通的，因此我們往往不能從單一的角度去看這些學者。剛才講船山的文學、史學、哲學、美學，其實是貫穿在一起的。

船山的詩文和戲曲研究，這部分則很少很少人做，但如果我們去看船山的詩，就會發現船山的詩和黃宗羲的詩有很大的不同。不同在哪裏呢？不只是風格不同，船山詩的艷情詩相當多。很難想像船山這樣的人，在詩裏講艷情，感遇啦，游仙啦，落花啦，這些當然可以從理性的角度去解說，但大部分看不出理性的，而且有很多非常露骨，蘭湯出浴啦，乳房以雞頭肉來形容等。有些有小序，這些該怎麼解釋呢？過去講船山，講理性多，講情性少。我們講晚明的情論，大多從陽明後學講起，但船山的情論，他與早期宋明理學家講的不太一樣。宋明理學家講情性、情趣，和理性是分開的，但船山講情性、情趣，他的很多工夫論不在明心見性，而落在情的處理上，這是非常特別的，而且顯示在文學創作上。這些部分應該加以討論。

我們也希望船山學能和當代西方的學術相結合，如讀船山的《宋論》、《讀通鑑論》，可以發現船山對法治有許多的討論，幾乎每一部分都在當代法理學或是法理社會學可以看到。

章啓輝（湖南大學嶽麓書院文化研究所）：

首先講一下大陸的船山學研究。應該說，船山學在大陸從晚清到現在都可以說是顯學。晚清是由於曾國藩的推崇，那是大家都熟悉的。解放以後，王夫之也是我們研究的主課題，主要是因為我們都把王夫之作爲偉大的唯物主義思想家來加以推崇。船山學是中國哲學中的重要方面，研究成果非常的多，我的博士論文是做王船山，所以對於這個方面的資料蒐集比較多，除了那些散見於史學、哲學的論著，我蒐集到船山學的專著，最重要的就有二十四本，這還不完全，論文大概一千多篇，因爲時間，我不能詳細地講。就研究的範圍講，按照經、史、子、集來分，每個方面都有人在研究，如果按照現代學術劃分，史學、經學、還有哲學、文學，這四大方面都是船山學研究中所涉及的，其中哲學占最多，約有百分之七十，史學大概百分之二十，文學與經學差不多一樣。大陸做經學研究的比例很少，跟臺灣差不多一樣，主要是對他的易學的研究，目前還只看到一本專著研究他的易學思想。我從網

路去找，找到了衡陽師範學院周示行先生的文章，他在一九九七年發表一篇文章研究王夫之經學的特點¹⁹，這篇文章對我啓發很大，他認為清代以來對王夫之的研究，主要是今文經學家就肯定他的今文經學思想，古文經學家就肯定他的古文經學思想，義理學派就肯定他的義理學思想，所以各個學派很不一定，而周老先生認為他主要是今文經學思想，提出了王夫之的經學是晚清今文經學的源頭。

第二，我講一下王夫之的經學研究。我主要是研究他的四書學，肯定也要了解他的經學，我主要看的是他的《易經》研究，因為他的易學與四書學聯繫更緊密。《尚書引義》只是看了與四書學聯繫緊密的部分。從整體上看，就像周先生所講的，我覺得王夫之的經學是很全面的，在他的全部學術研究中，經學所占的地位（剛才龔先生也講到這一點）十分重要。在他四十年學術研究中，有二十年是研究經學，這二十年的經學研究對他後來哲學、史學各方面的思想作用非常大，沒有這二十年的經學積累，就不會有後來哲學、史學的集大成。應該說，他是個傳統的大師，所有的學術和思想都是建立在經學的基礎上。我覺得王夫之是一個全面的人物，關於他的經學研究，我的總結是，全部以考據學為基礎。他的著作不管是五經方面還是四書方面，首先都是考據，每一本書中都有考據，《四庫全書》把他的考據學著作全收進去，而義理學的著作沒有收。實際上，考據是義理的前提，先有考據，然後才有義理。他的學術思想講求務實，把漢學的求實與宋學的義理結合起來，在考據學的基礎上，進行義理的研究。王夫之的經學研究的特點表現有三方面，首先是「訓詁必依古說」，特別強調任何學術的研究，都必得先考據當時意思是怎樣說的，他把每一部經典都力圖回復到當初的原義；第二個特點是強調「義理可以日新」，既然考據的目的是為了義理，所以強調義理必須日新；第三個特點是「古文經學與今文經學相結合」。從這三個方面來看，可以說王夫之在經學研究上也是一個集大成者。如果他是講調和的話，也可以說他調和了古文經學與今文經學。從學術指歸上講，他的經學還是經學義理學。

最後我講王夫之對晚清經學，甚至整個學術的影響。以前一般都說推崇王夫之要從曾國藩開始，我得到周先生的啓發，實際上，王夫之的學術影響要從魏源開始，當然魏源推崇他，主要是從今文經學上，這一點說明王夫之的今文經學思想對晚清產生深刻的影響；他的義理學，應該講，先是唐鑑對王夫之的義理特別的推

¹⁹ 周示行〈王船山的經學成就及其理論特色〉一文，見《衡陽師專學報》，1997年第5期。

崇，後來才是曾國藩的推崇。至於他的古文經學，《四庫全書》對他已經非常肯定，後來王國維的著作中，也能找到王夫之古文經學的特點，王國維對他一直很佩服。這兩個方面都對譚嗣同造成深刻的影響。

楊晉龍：

我是做明代《詩經》學的研究，剛好王夫之的書也有提到那一段，我非常感謝出了王夫之全集的教授。我不是批評，我純粹從《詩經》學的角度來看，提供一個訊息，王夫之《詩經》研究的考證並不特別用心，比如他的《詩經稗疏》和《詩經考略》就引入不少《申培詩說》和《子貢詩傳》的觀點，因此有關王夫之考據的問題，我的角度跟妳有點距離。

鄧洪波（湖南大學嶽麓書院文化研究所）：

我因為在嶽麓書院專門做書院研究，到哪裏都講書院，所以也有個外號叫「鄧書院」。今天大家到湖南來談湖南的經學，所以我就談一下清代的書院與經學，我想談三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清代書院的山長，基本上，尤其是後期，都是經學家。剛才講到嶽麓書院在清代有三王，王夫之是書院的學生，然後就是編《四庫全書》的王文清，當時四庫館有「記不清，問文清」的說法，他好像一部活字典，很多典籍，腦袋一敲就出來了，他在嶽麓書院做了兩任山長，前後十多年，而且定有學規，講究讀書方法，做了很多注經的工作，《詩》、《書》、《春秋》他都注意過，有很多的著作，都州「鋤經」什麼的，可惜現代整理出版並不多。他就是做以經學造士的工作，培養了很多人才。這是早期的情況，到了晚期有王先謙，做了很大的貢獻，在江蘇學政任上，在江陰南菁書院完成了《皇清經解續編》。這是一個總結清代經學成果的大工程，以往我們重視不夠。從經學角度來講，湖南相對比江浙還要落後，江浙地區好多有名的山長，都是經學家，可能都已進入各位的研究視野。我提出一個問題，從宋朝以後有了書院，它就成了一個「平臺」，經學家也好，理學家也好，都不是以個人出現，而是以書院為組織連帶地出現。我們過去對這個比較注意，比如《宋元學案》、《明儒學案》，因為作者都有書院講學的經歷，做學案就是作為一個學派來考察，所以就注意到書院與它的聯繫，但到了民國以後都不太注意師承關係，只是單獨挑出某一個人，從生平到什麼什麼之類的，也就是不太注意

老師與學生之間因書院這個平臺形成的群體關係。我一直覺得研究經學也好，研究理學也好，可能要注意書院在其中起了極大的作用，作為一個學派的象徵，作為一個基地，作為一個凝聚人材的東西，估計裏面很有文章可做。我的意思是無論做經學或理學的研究，都要注意到書院山長多是經學家，希望引起大家的重視，來幫忙做這個研究。

第二個問題，清代書院制定了很多規章制度，把經學教育制度化。如南京的鍾山書院，是一個典型的江浙地區的書院，從清朝乾隆二年起，楊繩武定了一個學規，這個時候從大勢來看，漢學還沒有起勢，還是理學的天下，他們就開始做這樣的工作。乾隆九年，科舉考試才開始出經史的題目。可見他們做的是很前衛的工作。鍾山書院的學規有十條，其中第五條說「窮經學」，接下來「通經史」為第六條，其中有個很有意思的地方，它把訓詁、義理、文章，通通列為經學的範圍，界定很寬泛，估計是想從程朱理學中走出來，我不敢肯定。這樣的學規很多，前期、後期都有，這裏只是舉一個例子。另外，書院也很注重學習的方法，剛才講到嶽麓書院的王文清，他有「讀經六法」、「讀史六法」，他視書院為高等研究的地方，是講道的地方，他的「讀經六法」，分為「正義、通義、餘義、疑義、異義、辨義」，這是一個高層次的經學讀法，著重如何研究經學；還有一個普及性的讀經法，如臺灣彰化白沙書院的學規，就先告訴讀經的基本道理在力行，以立品為主，這是一個比較低的層次。所以書院的經學教育是有層次的，從高到低，全面推行。

第三個問題，清代書院有切實的措施落實經學教育。舉個例子，清代比較落後的地方，如陝西的嘉陵書院，規定讀經與定膏火結合起來，二十天讀經多少就給多少膏火等等，有一定的標準與規定。總之，清代書院的經學教育是值得關注研究的問題。

蔡長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我研究的是清代中葉常州的學術和考據學，對於晚清，尤其是湖南這一帶的學者與學術，涉獵比較不深，所以今天的報告，只能就這幾十年來臺灣對於皮錫瑞的研究與內容，提出一點摘要。應該這麼說，只要對經學有認識的人，大概都知道皮錫瑞的大名，因為皮錫瑞的《經學歷史》、《經學通論》可以說是臺灣學子經學課程入門的教科書或者是參考著作，尤其是《經學歷史》經過周予同的注釋之後，更便於學子誦讀，基本上我對經學的認識，就是透過皮錫瑞的《經學歷史》而來的。皮錫瑞的《經學歷史》跟劉師培的《經學教科書》也就歷久不衰，經過書局不斷地

翻印，出現幾種不同的版本。《經學歷史》對於掌握兩千多年來經學發展的大勢，提供了基本的認識框架，而《經學通論》鮮明的學術立場以及充分的呈現，也為臺灣學界提供了相當可觀的基礎知識以及理論。今天在座的臺灣學者，大概都經過《經學歷史》、《經學通論》的洗禮，然後成為經學研究的愛好者，也就是說皮錫瑞的經學著作對臺灣學界有不可磨滅的貢獻。很可惜，相對於皮錫瑞在臺灣學界享有盛名和崇高的地位，對皮錫瑞本人和他的學術做深入研究的卻不多見，我檢視的文獻，去其重複，單篇論文大概十篇左右，專書也只要一、二部而已。綜合以上的材料，臺灣學界對皮錫瑞的焦點，主要集中在《經學歷史》和《經學通論》這兩部書上，《南學會講義》也有一些學者注意到，至於專門的著作，如《今文尚書考證》或者是《尚書大傳疏證》，這些研究到現在都很缺乏，這部分不管大陸或臺灣學界都可以做進一步的探討。

張火慶先生從「分期」、「尊孔與明經」、「治經必宗漢學」、「傳家法守顧門」四點來論《經學歷史》，他認為從這四點可以顯示皮錫瑞《經學歷史》一書的大要。顧沛君的文章有兩大重點，顧沛君女士可能是湖南人，她的文章是在臺灣一個小雜誌《湖南文獻》登出來的，她非常佩服皮錫瑞的學問，所以她認為《經學歷史》也可以用「比較經學」來概括。她也認為從〈開闢〉、〈極盛〉、〈分立〉、〈統一〉四章也可以看出《經學歷史》的精華，看出中國經學變遷的紛紜複雜的過程。蔡榮婷的文章比較有意思，提出兩點，一是就研經的立場而言，皮錫瑞雖宗仰西漢今文學家伏生，但《經學歷史》並沒有過分去排詆古文學和宋學，他對今古文之爭，儘量以客觀公允的態度作歷史評述；另外一點，就讀經問題而言，皮錫瑞認為經學應該跟時勢有密切的關係，所以讀經不應枯守字面或只在文字的推衍下工夫，而應該把握經書中的精義，把它發揮在日常生活中，成為一個活的知識而不是死的教條。陳全德先生主要是對「魏晉為經學中衰」的觀點來討論，分成四大重點，首先是歸納皮錫瑞認為「魏晉為經學中衰」的原因，其次是對「經學中衰」情況加以評述，再來是討論「鄭玄、王肅之爭」問題，最後則是從「經學中衰時代」來看皮錫瑞的經學觀。然後，陳氏對皮錫瑞的「經學中衰時代」的經學史觀，也提出了四點，分別是「尊孔與明經」、「治經必宗漢學」、「傳家法與守顧門」、「重今文而疑古文」來看皮錫瑞的經學觀念，其說法基本上與張火慶先生略同。趙制陽的〈詩經通論評述〉可以說是唯一一篇討論皮錫瑞《詩經通論》的文章。皮錫瑞的《經學通論》分《易》、《書》為一冊，《詩》為一冊，三《禮》為一冊，

《春秋》爲一冊，貫串古今，實爲經學的小百科。趙文專門討論皮錫瑞的《詩經通論》，根據皮氏關於《詩經》的觀點，分「詩序」、「毛傳」、「三家詩」、「詩教」、「風謠」五大部分，做詳細的討論。他的結論綜合了五大點，以其所言別具一格，所以詳錄於此：一是從求證態度上看、二是從思想模式上看、三是從論證方法上看、四是從言論矛盾上看、五是從家法意義上看。針對皮錫瑞《詩經通論》討論之後，對皮錫瑞以今文學的立場討論《詩經》的態度大加撻伐。胡楚生先生的論文主要是針對《南學會講義》進行討論，我已把結論寫下，各位前輩可以看看。

最後一點要說明的，臺灣專門研究皮錫瑞的，應該是在座的丁亞傑先生。

吳仰湘（湖南大學嶽麓書院文化研究所）：

我在博士期間就開始研究皮錫瑞，查找了大量的原始資料，對皮錫瑞的研究現狀也比較關注，今年來更得到中國文哲研究所林慶彰教授和廖秋滿助理很大的幫助，替我蒐集臺灣的皮錫瑞研究材料，使我受益不小，對我的研究幫助很大。蔡長林博士在《經學研究論叢》發表的〈關於清代今文經學發展的兩個路向〉，對我的啓發也很大，特別是評定皮氏在清代今文經學史上的地位，這篇文章對我有直接的啓發。

關於大陸的皮錫瑞研究現狀，因爲有一份打印的材料，我就不詳細說了。我總結大陸的皮錫瑞研究，發現有以下幾點值得注意：一是對皮錫瑞很重視，現有的儒學、經學及歷史人物的詞典及各種工具書，都對皮錫瑞作了或多或少的介紹。在有關戊戌變法和湖南近現代歷史的論著中，也都提到皮錫瑞在南學會的表現，可說是普遍的重視他，但是另一個很不相稱的現象是對他的研究很不夠。我根據手中掌握到的材料，認爲對於皮錫瑞的研究，嚴格講起來，才剛剛開始。大陸現有皮錫瑞研究專題論文七篇，其中兩篇專門講皮錫瑞的變法思想，根據《皮鹿門年譜》和皮錫瑞的《南學會講義》，對他戊戌時期的思想做了一番探究，但是大家知道這本年譜比較簡略，《南學會講義》也只是一個方面的材料，所以這兩篇文章對皮錫瑞變法思想的討論，還是比較粗淺，皮錫瑞變法理論的來龍去脈以及他核心的地方，沒有完全交代出來。我自己在研究中，盡量利用現存的皮氏詩文和日記。根據我的了解，今天對皮錫瑞的研究中，注意到利用《師伏堂詩草》、《師伏堂駢文》、《師伏堂詠史》的還只有丁亞傑教授，他在關於晚清《公羊》學的研究中，比較注意到發掘這些材料，其他的研究還沒有注意到這些原始的材料。我根據這些材料寫了幾

篇文章，一個是對他的史論作了專門探究，因為我從他的詩文中，發現他對歷史特別感興趣，有很多詠史的作品和專門評論歷史的文章，其中有很多值得探究的東西，特別是發現皮錫瑞在南學會講變法的時候，有很多獨特的地方，這與他長期研究古代歷史很有關係。皮錫瑞講變法主要是根據歷史的經驗，康有為主要是根據對經學的改造，他很明確地提出要跟康有為走不同的道路，我想對這個問題再作深入探討，可以啟發人們對戊戌變法的理論來源作新的思考。現有的戊戌變法研究，都是以康、梁為中心，這種單線的研究模式，現在應該有所改變了。另外一篇文章對皮錫瑞排外思想做了一個初步的考察，我根據他在甲午戰爭前後思想的轉變，發現他對待外國的侵略有截然不同的看法。其三是對皮錫瑞在戊戌時期和晚清教育改革中的表現也做了專門考察。此外還對皮錫瑞在南學會講學的內容做了一個總結。剛才蔡博士介紹了臺灣胡楚生先生研究皮錫瑞《南學會講義》的文章，這篇文章我是去年看到的，內容大致相近，只是胡先生的文章對皮氏講義中的學術部分更加注重。

皮錫瑞以學術名家，我們研究他當然也要以學術部分為主，但是現有的研究，在這方面非常不足，相對於對他生平和思想的研究，對其學術成就的研究相當不夠。我在打印的材料中，列舉了四篇特別值得注意的文章。支偉成的論述是大家比較熟悉的。盛冬玲等在《今文尚書考證》點校說明中，從清代《尚書》研究史的角度，來肯定皮錫瑞今文《尚書》研究的成就，這是我目前看到對《今文尚書考證》評價最高的文字。《晚清哲學》一書為皮錫瑞設立專節，並從清代今文經學的發展歷程中來看皮錫瑞，特別是對皮氏關於春秋公羊學的研究作了很好的肯定，但書中提出皮錫瑞在晚清今文經學復興中起到很大的作用，這一點還值得商榷。目前最好的一篇文章是田雲漢《中國近代經學史》第六章第二節，也是從清代今文經學史來確定皮錫瑞的地位，認為皮錫瑞是清代「正統今文學的殿軍」。雖然田漢雲先生對皮錫瑞經學的考察範圍尚嫌狹小，主要是根據《今文尚書考證》、《經學歷史》和《經學通論》來提出一些意見，範圍比較小，但有些提法是比較新的，可以給人一些啟發。

關於皮錫瑞的著作，一是《皮鹿門年譜》，二是我在博士論文基礎上修改成書的《通經致用一代師——皮錫瑞生平和思想研究》²⁰，側重於皮錫瑞的生平經歷和

²⁰ 《通經致用一代師——皮錫瑞生平和思想研究》由長沙嶽麓書社2002年1月出版。

政治思想的研究。

就整個情況來看，現有的皮錫瑞研究，重視政治而忽略學術，這與他的身分是不相符的。其次，對皮錫瑞學術的研究，範圍過於狹小。剛才蔡博士也談到臺灣研究也是偏重《經學歷史》和《經學通論》，皮錫瑞的其它經學著作還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今後的研究要朝這個方面進行，特別是通過對皮錫瑞衆多學術著作的考察，將他在清代今文經學史上的地位更好地揭示出來。

車行健：

我有一個小問題要請教各位學者。皮錫瑞的《經學通論》是分成一經一經地講，而學界一般也就是將其講個別經書的部分就逕稱之為《某經通論》，如《詩經通論》、《尚書通論》等。我不曉得是不是可以這樣用？您是否知道皮錫瑞本人是不是也是這樣用？還是這種名稱只是比較簡單的不正確用法？

吳仰湘：

皮錫瑞確實曾經用過《詩經通論》、《尚書通論》這樣的名稱。

吳銘能：

皮錫瑞的《師伏堂日記》到現在為止沒有一個完整的出版，但我知道《師伏堂日記》的原稿在大陸，剛才吳教授的文章也提到看過，如果能將《師伏堂日記》排印出版，我相信對皮錫瑞經學思想變遷的歷史，一定會有一個全新的認識，不曉得大陸現在進行的情況，是否可以簡單向我們介紹？

吳仰湘：

關於《師伏堂日記》，前兩年嶽麓書社的總編唐浩明先生也提到過，意思是要整理出來。但是有兩個困難，一是篇幅很大，根據我的初步估計，有一百多萬字。第二個困難是所需出版經費過大，還有一個更大的問題，現在《師伏堂日記》藏在湖北圖書館，我跟他們聯繫過，一時還難以拿出來公開出版。

程克雅（東華大學中文系）：

這次分配到關於譚嗣同的研究，我感到很詫異，因為我一直在研探乾嘉中期的

考據學跟音韻訓詁方面。現在只是將現有的，我寓目所及的臺灣學人相關研究歸納，並將議題的核心做簡單的陳述，這一定有很多的不足，還需要請教在座的各位。

我觀察譚嗣同在有限的三十三年生命當中，受到的最大關注，主要來自於他的精神人格與個人形象的塑造。他的詩句曾經說過「誓上沙場爲鬼雄，抒展懷抱勿蹉跎」，所以他本身有這樣的豪氣，而且在戊戌事變當中成爲捐軀的烈士。以他這樣的精神人格來看，引起後人的研究來講，他的資料在這次的會上分量並不算少，尤其是海外的研究。當然，因爲《仁學》的篇幅較短，而且從他入手，可以說是直接切入整個中國近代問題的焦點，因此，包括德國、美國、英、法域外對譚嗣同的關注可以說是一直非常熱烈。在我的介紹之中，分成四個不同的主題，首先是譚嗣同的《仁學》與傳統學術，二是《仁學》與晚清西學，三是譚嗣同的《仁學》與佛學，四是譚嗣同與中國近代史（包括近代思想史、學術史與政治史中譚嗣同研究的回顧）。我們所熟知的黃彰健院士，他是譚嗣同的同鄉，湖南瀏陽人，除了撰寫《戊戌變法史》這樣重要的著作外，還將其尊翁所撰《瀏陽鄉土志》也帶到臺灣去發表，其中記載著黃徵與譚嗣同在戊戌變法上的事蹟，這可以說是考察譚嗣同比較早期的資料^②。因此，早期在臺灣主要資料還是在「戊戌變法」與「維新運動」這兩大主題底下的主要子題，並沒有以譚嗣同之名刊布。在六〇年代刊布出來主要是翻譯的著作，就是李永熾翻譯小野川秀美《譚嗣同思想》的說明，除此之外，比較受注意還不是經學的方面，因此在這裏寫《仁學》與中國傳統學術方面，自然成爲寫文章的焦點。我在第一部分所談的通、自由、平等這三項，可以說是學者比較關注的主題，如淡江大學的王樾教授曾經提過「會通與轉化」，李增教授也談過「譚嗣同的仁通學」，這個主題看來，「通」不僅「通於古今」，同時還「通於中西」，在此概念下，譚嗣同在回顧經學或引用經學，是站在求博求通概念下的方式發展的。除了通學之外，其次是自由的觀點，在他「衝決網羅」的主要概念下，包括政治領域、哲學領域都談到他的自由平等觀念，以及著重人本跟人文的關注，譬如袁

^② 在整理座談會發言稿期間，十月十四日下午二時與黃院士在學術活動中心不期而遇，我特別向黃院士請教其尊翁與譚嗣同的事蹟，他告訴我，其父原名「祖勛」，後改名爲「徵」，清宣統己酉科優貢。入民國後，任株萍鐵路局秘書，後調粵漢鐵路車務處文牘課課長，民國二十年逝世，在此感謝黃院士提供協助。關於黃徵與譚嗣同之關係，詳見黃彰健：〈瀏陽鄉土志印行後記〉，收入黃徵：《瀏陽鄉土志》（臺北：中央研究院，1967年）。

信愛寫的〈仁學與心靈自覺〉，丁興祥、陳祥美的〈人際際遇與生命夢想〉，從梁啟超寫譚嗣同傳記來做研究，開展出他心理的個人自覺，談個人主體的問題。另外，南學會及湖南創新學主張個人主義，兩性平等的主張上，比較新的著作有文藻外語學院林景蘇的〈譚嗣同的兩性平等觀〉，還有比較早的阪元弘子寫過《譚嗣同的性別意識》，主題都談到性別平等、兩性平等，這樣他已經把古代經學中提到的通、自由、平等概念放在《仁學》的課題裏面。仁學與經學比較有具體的聯繫來講，譚嗣同也曾經「衝決網羅」、「反抗名教」，在三綱五常的回顧下，前面當然有積累相當背景的討論，如張灝的《烈士精神與批判意識——譚嗣同思想的分析》，另外還發表在日本期刊上的〈譚嗣同的仁學批判破壞與建設〉，在經典的批判上，也發覺譚嗣同對經典非常獨特的看法。由此看來，譚嗣同的思想、變法和歷史觀往往可以互相映照的，這種觀點在李永熾翻譯小野川秀美〈譚嗣同的變革論〉就已經提到過，近年中央大學的賀廣如教授也提到過〈論譚嗣同的變法與復古〉，從譚嗣同對《周易》變的概念及《周禮》的復古講法，回顧到譚嗣同的變古、復古跟復遠古的講法。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並沒有將譚嗣同獨立成專章，只把他放在「維新運動」的一部分，可是我們可以發現近年來大陸史學史的著述上也都點出了，如吳澤《近代史學史》，多人引到譚嗣同的段落，都會提起他四項的重點，一包括「進化史觀」、二「夷夏之辨」、三「民族思想」、四「唯意志的歷史動力」，這四項在臺、港的論著中都呈現完全不同的學術樣態，也就是在「進化史觀」的解釋，我們往往可以看到復古的思想，在「夷夏之辨」的講法，我們可以看到師夷、甚至變夷的思想，在「明史」或者「歷史動力」的講法來看，我們都覺得還可以進一步來討論。由於時間的關係，譚嗣同與中國近代史的討論，是我們無法忽略的一章。

丁亞傑（元培科技學院）：

蘇輿編輯《翼教叢編》作為反對新政的理論基礎，所以我就把《翼教叢編》作為湖南新政運動保守派理論的脈絡下研究。在臺灣做湖南新政運動的研究是林能士，碩士論文由李守孔教授指導，與蘇輿相關的是第三章第一節〈守舊士紳的攻擊〉，該節大部分原始文獻取材於《翼教叢編》。其次研究《翼教叢編》的大概有四篇論文，其中有博士論文一篇，單篇論文三篇（其中有兩篇是我自己寫的），我嘗試從新舊對經典觀的不同做說明，然後是楊菁的文章，比較著重介紹蘇輿的生

平、《翼教叢編》的版本，以及新舊兩派人物的生平。在今年賴溫如寫了博士論文《晚清新舊學派思想之爭論——以《翼教叢編》為中心的討論》，是唯一的一本專著，總共分爲七章，每章後都附有前人不同意見的看法，譬如說學術思想、政治思想、教育思想、保種保教之爭，每一章都有新舊二派論爭的對照表，算是蠻清晰的，是目前爲止最完整的一本。書末附有相關的參考書目，可補之前林能士研究的不足。因本書是今年六月寫成的，我透過同學與之交換論文，但是我來大陸之前還沒有拿到論文，不能在此做詳細的討論。

接下來，我提出一些未來可以研究的展望。比如蘇輿的《春秋繁露義證》缺少研究成果，可與康有爲的《春秋董氏學》做比較研究，目前《辛亥濺淚集》及《翼教叢編》已由中央研究院文哲所點校中，但點校者今天沒有來，有關情況我不是很了解。至於《翼教叢編》所收錄的作品，如葉德輝《輶軒今語評》可與張之洞《輶軒語》、徐仁鑄《輶軒今語》合論，至其《長興學記駁議》可與康有爲《長興學記》並析，而舊派人物如張之洞、王先謙、朱一新、葉德輝等，雖然賴溫如的博士論文有提到，但仍可作爲深入的研究。另外補充一點，有關葉德輝的《覺迷要錄》，現在也缺少研究的成果。目前對臺灣研究蘇輿成果簡單介紹，可以發現我們其實可以繼續做的研究範圍跟方向、討論的論題還相當多，因爲有關的研究還是非常的簡單。

張晶萍（湖南師範大學歷史系）：

我對葉德輝的研究，純粹是出於興趣。在湖湘文化之中，我覺得他是個不該忽視的人物，他的學術成就不在二王（王先謙、王闓運）之下，李肖聃對他有很高的評價。可是迄今爲止，如此一個全面性的人物，基本上還是一個薄弱的環節，在很多方面還是一片空白。首先，關於他的生平，沒有一部翔實、全面的傳記。對於這樣的人物，我們大家都知道一些，如著名的守舊派、反對康梁變法、引發搶米風潮、擁護復辟帝制、反對工農革命、被工農革命鎮壓，也是著名的學者、藏書家，但是僅僅局限於這些，對葉德輝沒有全面的認識。葉德輝的形象被固定在「出入公門，魚肉鄉里」的劣紳上，有臉譜化的傾向，很多細節都沒有進一步的討論。在一九八六年，嶽麓書社出版了一本《葉德輝評傳》，這本書非常之薄，觀點也很舊，但是我覺得在八十年代還是可以理解，在研究葉德輝有筭路藍縷之功，尤其在論學方面。但是對葉氏本人，則基本上採取「歷數劣跡」的方式鋪敘，強化他作爲劣紳

的一面。如果大家感興趣，有兩篇文章值得注意，一是程千帆、楊翊強寫的〈葉德輝《光復坡子街地名記》補注〉，寫得非常好，比較來說，《葉德輝評傳》的作者還沒有他的視野，因為程老先生收有當時的原件。從文章看，葉德輝對黃興並沒有惡意的誹謗，他的文筆很好，有些話說得也有道理，我們以前沒有注意到這一點。另一篇是龔育之的〈從葉德輝之死談到黃興的流血革命和胡元倓的磨血革命〉，對於了解葉德輝之死的前因後果有幫助，還談到中共對此事的檢討，包括解放以後，毛主席就說過像葉德輝這樣的人，不應該殺他。總的來說，關於葉德輝的生平，大家都知道一些，但是都說不清楚。

二是相對於葉德輝其人的研究，對他的學術研究，自一九九〇年以來有發展的勢頭。學者在「葉德輝其人固不足取，其學實有可傳」的思想指導下，對葉德輝學術進行研究，相對地沒有什麼顧忌，但是對葉德輝學術的研究，也還僅僅在目錄學、版本學、校勘學等方面給予肯定。我可以提供一個數據，從中國期刊網(CNKI)檢索，共查到三十二篇文章，其中以《書林清話》為論題有五篇，以葉德輝藏書及其思想方法為題的有六篇，以葉氏目錄版本學為題的有二篇，以葉德輝出版思想、刻書活動的有三篇，這些數字可能不太全，但大體上可以看出研究的重點所在。從這些文章看來，我覺得沒有抓住要點，在葉德輝的學術中，就像李肖聃講的，他的目錄、版本、校讎只是一種工具，葉德輝是乾嘉漢學的學術取向，所謂「崇聖不可以徒致，必首事於通經；通經不可以陵節，必循途於識字；而詔後學以所從入，必先於簿錄，考溯其源流，開示其闡奧」，認為治經要了解目錄、版本，還要懂文字學，也就是說他的學術路徑，根本在通經。他首先是個漢學家，但是在經學研究方面，我蒐尋的結果，除了我寫過文章外，沒有一篇有關葉德輝經學研究的文章。我的文章沒有具體探討他經學研究的內容，而是關注他的學術理念，他從漢學到朱學的取向，對公羊學的批駁，近代湖南真正深入漢學之堂奧的，除了王先謙，還有葉德輝。

在以後的葉德輝研究中，我覺得有幾個問題值得探討，也希望引起人們的關注。一、在湖南的新舊之爭中，葉德輝究竟闡述了那些思想主張？過去我們在這個問題上，總是批判他假學術之名以行守舊之實，至於從學術上看，他到底講了些什麼，又有哪些是合理的？對此做一下探究，有利於加深我們對葉德輝的看法。二、從湖湘學派的歧異性來看，葉德輝的經學主張究竟代表一種什麼主張？我有個感覺，近代以來湖湘內部存在一種漢宋之爭，葉德輝的經學思想與這種漢宋之爭，究

竟是什麼關係？湖南近代以來，對漢學有一種否定，最典型的如孫鼎臣說太平天國是由漢學引起的，葉德輝對此有很多的批駁，我們怎麼把他放在近代湖湘文化發展的背景中來定位。三、我覺得湖南在晚清興起一股漢學思潮，所謂「三吳漢學入湘」，葉德輝在此起了什麼作用？最後，葉德輝不是一個異端，而是代表湖湘文化守舊的群體，而這個群體有沒有我們忽略的地方？就像剛才鄧洪波老師提到書院留下很精粹的內容，值得我們去探討，這樣我們對湖湘文化的認識，就不僅僅只有譚嗣同、皮錫瑞這樣比較先進的思想，而是有多面向的評價。

楊晉龍：

我們討論一早上湖湘的學者，我想大家都很清楚湖湘整個學術文化水準是相當高的。我想請教諸位的，就是我們看徽州的地方有徽州學，安徽的徽州，現在出了一本《徽州學概論》之類的，我看過《湖湘文化綜論》等一類的書，其實都是很摸不著邊的論述；鄉土文化需要一個團體傳播的，像湖湘這樣一個地區，有這麼豐厚的文化資產，我相信以諸位的能力，應該可以寫出比較具體的東西。我想，本地人的本土研究，對其他地區的人會有比較大的幫助。我就提出這樣一個想法請教大家。

陳谷嘉（湖南大學嶽麓書院文化研究所）：

最近湘潭大學湘學研究所在做這方面的研究。

朱漢民：

湖南有幾家都在分頭做，如省社科院、我們湖南大學嶽麓書院、湖南師範大學、湘潭大學和湘潭師院，現在是分頭在做，當然有幾種做法，有一種是做具體化的、與現實結合的研究，還有一種是做學術性的，這種研究還不夠。所以這一次會議非常有益。其實我們也有一些計畫，準備一個一個地做下去，做些更細緻的工作，綜合性的研究，我想會有，不過可能還要一段時間才有成果出來。

王興國：

現在對湖南近代的專門研究還是不少，比如像王船山、陶澍、曾國藩、左宗棠、魏源、郭嵩燾、譚嗣同，我們多次開過專門的討論會，今天討論的人物中只有

王先謙沒有開過學術討論會，只開過小的座談會。關於湖湘文化一般的介紹很多，但是系統的就少了，最近我們出了一本《湖湘文化大觀》，我在裏面寫哲學部分，從黃老帛書一直寫到毛澤東，不過還是比較簡單。

梁紹輝：

對不起，我來遲了。我就說說曾國藩。他這個人有四個特點：一是成績很大，二是東西很多，三是思想很雜，四是反映很散漫，要研究他的作品，要注意到這四點。曾國藩把學術列為四大類，也就是義理之學、考據之學、辭章之學和經濟之學，就學術成果而言，我覺得曾國藩辭章之學最大，考據之學次之，義理最劣。他講經濟之學，以為始於治身，終於濟世。他的辭章之學成績最大，這不用說了，考據之學次之，他對義理的考據，對人物的考據，對典章的考據，都蠻厲害。我認為他的義理之學最差，義理之學就是宋學，對於曾國藩的宋學，「介於似懂非懂之際，居於半行半廢之間」，這是我兩句精采的話哦。所謂「似懂非懂」，曾國藩已經夠傳統了，但是他的學問一講天人之際就薄弱了，就不是那麼一回事了；說到「半行半廢之間」，「半行」是指他的實踐，「半廢」就是一部分丟了，他丟的就是天人之際。宋學就是講天人關係的，對於天人之間的關係，人怎麼來的，怎麼去的，宇宙萬物是怎樣生成的，對這一套，曾國藩不知道是怎麼考慮的，搞不懂。我講他處於「似懂非懂之際」，舉個例子。一個是談《中庸》，他一談《中庸》就頭痛，對《中庸》的理解太差，《中庸》就是說的天人關係，他搞不懂。

曾國藩這人，從實踐來講，這個人修身很好，刻苦，我們都做不到，他臨死前的一天還在寫日記，死前的二天，他一心一意讀書，讀《莊子》，讀《四書》，沒有哪一天不讀書，人活得很累。修身很好，持家也很好，對家人要求很嚴。

朱漢民：

首先要非常感謝臺灣來的朋友，這麼遠來跟我們交流，討論晚清的湖湘經學，對我們有很大的促動。近代湖南出了那麼多人物，在學術上有那麼大的成就，今天的學術怎麼來做總結，我們還做得不夠，愧對先人。當然我們過去也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還沒有達到應有的高度，我們下一步會繼續努力，我們其實也有這種規劃。嶽麓書院想對湘學做些總結性的工作，怎樣深入下去，我想今後還要多多交流，所以這一次對我們是一次促進，我們下一步再作深入的研究，我想肯定會有一

些好的成果出來。

我在這裏還要感謝中研院文哲所給我們送了這麼多的書籍，都是關於經學研究的，我們把它們放在御書樓資料室，回頭我們也有一些資料送給大家。